

书人茶话

# 人人说未来,未来会如何?

■ 唐山

对现代人来说,未来已是日常:学生谈理想,上班族写工作计划,财务审批预算,管理者做战略分析……在今天,不善设计未来者会被视为浑浑噩噩,缺乏理性。

然而,未来只是“模糊的镜子”:一方面,人们预测的未来,都是根据“过去的规律”推导而成,但“过去的规律”在“未来”可能失效;另一方面,人有主动性,可依据“预测结果”进行规避,致其失准。

以人类的有限理性,尚不具备解决超复杂问题的能力,预测的对与错,只能交给概率。所谓“预言家”,往往模糊了关键因素,而不说清“2年后实现”还是“20年后实现”,意义不大。但我们依然喜欢预测未来,因为它提供了当下的行动指针和动力,且饱含着各方“对当下的理解”和“对将来的期待”,这些都是智慧的结晶。

## 未来不能让技术说了算

“未来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未来之中。”在《未来漫游指南》中,作者们的结论振聋发聩。

我们今天的生活,即老一代未来主义者预言的未来,有的很准确,有的错得离谱。看他们留下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即知如何想象未来。事实是,人类仍无法时空穿梭,没有挥舞光剑,上班不乘坐飞行汽车,未使用机器人管家……可今天常见的智能手机、家用计算机、数码相机等,前人却几乎没预测到。

显然,前人落入“未来主义谬论”中——高估短期进步,而低估长期进步。他们放飞想象的时代,新机器纷纷登场,他们以为这是大趋势,可有的技术会突然停滞几十年,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些技术,成了真正的“未来技术”。“发明大王”爱迪生曾说:“留声机没有任何商业价值。”肯·奥尔森(个人电脑奠基者)说:“任何人都不会在家中放一台计算机。”如今看来,皆成笑话。

本书列出整整十条“未来主义谬论”,意在为“未来技术”祛魅:它不等于“领先”,也并非完美,人类选它,是因“个人和集体作出的古怪决定”——技术发展并不客观,而是与人、文化与社会的选择息息相关,它们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塑造着未来。

本书带读者做了一次“未来技术”遨游,既言长处,亦及短处:脑机接口可能被黑客利用,把人变成赛博奴隶;

量子计算超群,但差错率惊人,且须在-253℃极低温下运行;

人工智能目前只及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如发展,可能掌控人类;

虚拟现实技术或将文明困在虚拟世界中,人类至今未找到外星文明,可能它们已遇此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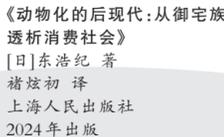
核聚变发电成本可能是核裂变的四倍;

纳米工厂高效,但纳米机器人能在50分钟内,重组地表所有物质,彻底灭绝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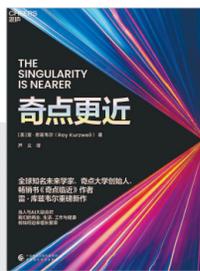
诚如书中所说:“最重要的变量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我们的政治、道德、司法和专业机构或许会对未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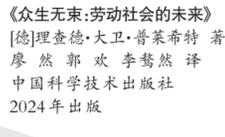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美]史蒂文·诺韦拉  
鲍勃·诺韦拉  
杰伊·诺韦拉 著  
刘秋秋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  
[日]东浩纪 著  
褚炫初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奇点更近》  
[美]雷·库兹韦尔 著  
芦义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4年出版



《众生无束:劳动社会的未来》  
[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 著  
廖然 郭欢 李蔚然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出版

木不会将我们从自己的牢笼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创造或毁灭、解放或奴役、启迪或控制。这些选择将主宰我们的未来。”

明天如何,应让人说了算,而非技术说了算。

## 未来还会有文化吗?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文化会不会死于未来?很多人觉得这是杞人忧天,网上的御宅族们不正在推进御宅文化吗?变的只是形式,而非内核。日本学者东浩纪却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发出盛世危言。

表面看,御宅文化传承有序,许多中年人亦乐此不疲,围绕一批经典动漫,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认知习惯和沟通规则,虽肤浅,却无大碍。

东浩纪却发现,御宅族并不是“拒绝长大”这么简单,而是正变成另一种人——只保留人性的躯壳,内心已动物化。所谓御宅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反文化——彼此抄袭,鄙夷原创,只要能唤醒粉丝的记忆,即可风行,成了“萌要素”的汇编,而“萌要素”不过是各种俗套,如不治之症、前世宿命、无法交到朋友的孤单女孩,或猫耳朵、铃铛、大大的手脚、女仆装等。

为什么大家追捧拟作,而非创作?因为创作是用小故事讲述大叙事,即人与“上帝”的关系、生命的意义、何为自我等,而在消费主义冲击下,人人都是讲述者,大叙事渐渐崩溃,听众从叙事中获得共情的能力日渐凋零。

没有大叙事这个他者,自我便失去了镜子,我是谁、我该如何度过今生等“根本之问”,也就无法被解答,造成心灵空虚,只能用戏仿、拟作、拟像来填充——御宅族们将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假装它就是自己。“意义”缺位,御宅族只能维持残骸化的社交,内心孤独难言,成了失去激情的“活死人”。

本书虽聚焦于当代日本文化的困境,却因对后现代“文化”的深入揭示,具有了普适性。当有一种未来是人文精神死亡、人类变成动物时,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它吗?文化真的会从此死去吗……种种疑问,引人深思。

## 再过20年,人类将永生?

《奇点临近》的读者知道,雷·库兹韦尔曾预言人类将在2049年永生,因技术在加速发展,只要将“我”传入电脑,就能永生。

反对者则认为:技术不可能一直加速发展;将意识传到电脑中,将出现两个“我”,这怎么可能;“永生说”近乎奇迹;新技术会带来各种问题,现代人未必比前人幸福。

没想到,库兹韦尔会在十多年后再写一本《奇点更近》,因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印证了他的“技术加速发展论”,使他对“永生论”也更执著。

在新书中,库兹韦尔认为两个“我”不奇怪:人类左脑、右脑分别运行,专家曾误以为左脑负责语言,其实右脑也负责语言,但我们不觉得有两个“我”。其实,神经元都在并行运转,相当于1000多亿个“我”,但我只意识到一个。换言之,“我”很可能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妥协。

把意识上传到电脑,“我”仍是一个,它能与存入电脑中的“他”交流,能像人工智能一样处理海量数据——“我”也许意识不到超能力从何而来,以为是与生俱来。

这是奇迹吗?雷·库兹韦尔可不这么看。如果说奇迹,生命才是最大的奇迹:宇宙大爆炸后一秒,密度参数偏差1/1013就不能形成生命;在10的1023次方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有足够低的熵,能形成生命,用天文学家休·罗斯的话说,这就像“一场龙卷风刮过一个废品堆,结果完美组装出一架波音747”。“出现生命”这样超低概率事件都能发生,人类为何不能永生?

《奇点更近》的魅力,在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这使它更像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这也提醒我们,觉得生活黯淡无光,很可能源于建构未来能力的欠缺,不梦想未来,就会丧失使命感。事实是,进化并没有停止,人类还在前行,我们可以从生物,变成半人半机器的赛博人,成为更强的“我”。

像库兹韦尔那样相信未来——“永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生命中看到向上的光,并与其同行,这大概就是阅读《奇点更近》的意义。

## 未来的工作是什么

“自动化率超过70%,即濒危职业,随时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类似声音已为人熟知,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德国学者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的《众生无束:劳动社会的未来》的解药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不需任何条件与资格,政府给每个公民发一笔基本收入。

作者认为,现代劳动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工业化产物。在古希腊,教师、医生、律师等长期声名不佳,因他们“用不光彩的报酬玷污了光荣的工作”。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人口过剩,靠行会分配工作机会,人们普遍轻视辛苦劳动的人。

近代工厂诞生后,劳动才被说成是“美德”。马克思指出,人本可在农耕、牧民、诗人等职业中自由选择,但近代工厂把他固定在一个工种上,长期重复劳动,剥夺了他多方面的发展空间。现代工厂则与消费主义结合,用高工资、高消费绑定劳动者。

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工人已无需长时间工作便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说,将来工人每天工作三小时已足够。可100多年过去了,劳动时间不降反增。不是社会真的需要更多商品,而是企业主设置了太多“狗屁工作”,超40%的白领自觉没创造价值,这些职位拉低了整体效率。企业主这么做,因为当员工相信多工作能多赚钱时,他才能利益最大化。他宁可安排员工去做大量的无效劳动,也不愿让员工每天只劳动三小时。

事实证明,不改变传统生产关系,就算科技提升,整体效率也难提升。可人工智能将大大提升效率,导致近50%的劳动者下岗,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减少劳动时间,让人人有工作,已成当务之急,可企业主没动力做,能拖就拖。

普莱希特认为,只有打破“多劳多得”的传统观念,想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普莱希特的想法虽好,仍坚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毕竟,图谋作业可放开思路,具体操作则应谨慎。

无论如何,本书可帮助读者拓展对未来职业的认识,早思考、多思考总会受益。

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理论上来说,虽然精英阶层获益最大,但因为所有人的生活都改善了,这属于帕累托改进,因此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在政治上,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本书特别介绍了“关系平等”这一概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收入增加只是一方面,得到精英阶层的平等对待、公共服务的提供,甚至“尊严”,这些更为重要。而在这些方面,智利做得很不好,所以才会有2019年的大规模骚乱。

第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及其动因,只有拉长观察时限才能给予更准确的评价。据说当年基辛格曾问周恩来总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周总理回答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太近,无法对它的意义作出确切的评判。智利在全面实施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经济表现并不好,曾引起对其政策的广泛质疑。实际上,这与当时的能源危机以及美联储实施超级紧缩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有关,并不是智利自身的拉胯。更令人意外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皮诺切特下台后,历任民选政府没有摒弃之前军政府的政策,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当人们以为新自由主义获得完胜,2019年骚乱又爆发了。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智利人均GDP被巴拿马超过,降到了拉美第二,2020年又被乌拉圭超过,而且乌拉圭的基尼系数只有0.4。所以,对于“智利计划”的评价,现在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无法做可控试验。所以研究的样本越大,越有利于总结和发现一般规律。如果这个样本还很特殊,就更没有价值,因为它提示我们,可能还存在更底层的规律有待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智利,因为它够特殊,而《智利计划》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 为什么是智利?

■ 方晋

达经济体行列。

这个稀有的群体包括我们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在某程度上,中国早期改革开放也是受到了“四小龙”成功的启发。不过,因为有了日本的先例,“四小龙”的经验就显得没有那么特殊了。真正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群体还包括位于拉丁美洲的智利。智利远离所有的发达经济体,而且在经济发展政策的讨论中,拉美地区一向都是作为反例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智利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发达经济体行列,其经验毫无疑问非常值得研究。

1973年,智利军方在皮诺切特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推翻左翼民选政府之后,邀请“芝加哥小子”进入政府并主管经济政策。这些深受自由主义理论熏陶的经济学家们实施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放开价格管制,降低进口关税,私有化国有企业,放松政府管制,甚至将教育和养老市场化等等,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且明显早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改革。在经历了初期的困难和挑战之后,智利经济走上了快车道,成为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智利的成功,固然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但在西方则更受追捧,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作为一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智利想上世界新闻头条不容易。一次是2010年成功救出被困两个月的矿工,为“智利奇迹”增添了新的注释。然后就是2019年历时几周的全国性骚乱,其起因竟然是因为地铁涨价,涨幅仅相当于4美分,而当时智利的人均GDP接近1.5万美元。看到这方面的新闻,不免让人对智利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和效果有所怀疑。

好在,中信出版集团的新书《智利计划》——芝加哥小子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对“芝加哥小子”引领的智利新自由主义试验的来龙去脉、发展进程以及综合影响做了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不仅解释了智利发展中出现的悖论,也让我有了新的发现,引发了新的思考。

首先,智利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起源于“计划”。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正酣,美国政府担心左翼思想在南美地区扩散,专门启动了“智利计划”,让芝加哥大学培养智利经济学家,让他们在思想斗争中发挥“作用”。“芝加哥小子”从象牙塔进入庙堂之后,新自由主义灵魂人物米歇尔·弗雷德里克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也先后到智利,给予他们精神和理论上的支持。不过,“智利计划”的创始者估计也想不到他们鼓吹的理论真的能够付诸实践,且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

其次,智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智利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比例,从最高峰的将近60%左右下降到现今不足10%。但是描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没有明显改变,1970年大约在0.47,与2017年处于同一水平,在以收入差距大著称的拉美地区也处于平均水平。但如果计算财富差距的话,智利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47.9%的财富,

三味书屋

## 老树春深更著花

——读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

■ 范金民

樊树志先生于2003年撰作出版了100余万字的《晚明史》,现今又续写出版了200多万言的皇皇巨著《重写晚明史》,20多年间,持续探讨评述晚明70余年的历史,纵明史国际学界,尚无先例,也绝无他例。读者难以想象,这样一部篇幅浩繁的著作,竟然出自一位退而不休20来年的耄耋老人之手,没有动用国家一分科研经费。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祝贺的同时,必须表达深切的敬意。

樊先生先后出版过《万历传》和《崇祯传》等颇具学术影响的晚明皇帝传记,出版过总结晚明历史的《晚明史(1573—1644年)》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长期驰骋于史学研究尤其是明史研究的著名中国史学家。现在我们捧读到的《晚明大变局》《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和《王朝的末路》五卷本晚明史巨著,对晚明时期作出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以醇正而又典雅的文字,形象地展现了晚明波澜壮阔的社会风貌,清晰地揭示了晚明历史变迁的特点,标志着晚明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重写晚明史》在把握晚明历史的宏大主题上,开辟境界,迭具创意。在中国断代史领域,向有晚清大变局、唐宋变革、元明变革之说,樊先生论证结合,理清纷繁复杂的晚明历史头绪,敏锐地提出晚明也有大变局,显示了学术功力和学术眼光。作者认为,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晚明时代中国的近代化已初露端倪。作者从“海禁一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的兴盛、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这六个方面的剧变来论述大变局,而且在每个方面都有新的表述,很多方面的论述多是不易之论。全书对重大问题的把握,举凡首辅之争、隆万新政、神宗与张居正的恩怨、万历三大征、明末三大案、东林与复社、明廷的抚与剿及战与和、市镇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晚明中国在世界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等,堪称允当,不少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如评“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功过得失,仅引录时人的三言两语,说其“威权震主,祸萌孽孽”“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就概括了一代名相张居正的人生特征和社会地位。再如万历年间的平定播州叛乱,在明清两朝改土归流和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方面有着较大的作用,作者采朱国桢之说而摒弃申时行之说,认为将之视为万历一朝的盛事并不过分,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对于嘉靖倭寇的原因和实质,作者在考察了嘉靖大倭寇与朝廷政策、社会经济的关系后指出:“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威德兼施、命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嘉靖大倭寇’所引起的‘倭患’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朝廷必须放弃海禁政策。”这一结论,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富有启发意义。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问题,是一个研究得相当深入的问题,而且是晚明史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耶稣会士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而且使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融入了世界。这后一点,几乎是此前的相关论著从未提及的。神宗在位48年,近30年晏处深宫不临朝政,既有研究认为其“溺志货财,也就没有心思过问朝政”,或者认为是专用“软熟之人”申时行所致。作者认为,申时行的迁就为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唐疏懒提供方便,神宗怠于临朝的最主要原因是长期耽于声色,以致疾病缠身,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王朝的末路》篇论道:“关于周延儒之死,无论是被吴昌时所累,还是被陈演所愚,最终处死他的毕竟是皇帝。短短几年中,皇帝接连处死两名内阁首辅,绝非常事。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是超过他们,而且对他们信任备至的皇帝,难道不应该追责吗?”这就触及了问题的根本。

《重写晚明史》有体有要,深得史体。樊先生是明史研究的大家,熟稔史著的体例体裁,阅读《重写晚明史》,看得出来,似是采用二十四史官修史中质量最高的《明史》的写法,往往大段引录时人的奏议或说法,而后作透彻的分析,夹叙夹议,寓论于史,从而得出顺理成章而又充满新意的结论。全文文词练达,词旨畅明,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不独具有史识,兼且讲文笔之法,文笔优长。全书以叙事方法,流畅的语言,传神的文字,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赏心悦目、形象生动而又精审到位的文句。如描写张居正与高拱斗法,穆宗临危托孤,神宗母子关于国本的对峙,神宗、思宗亲政的描写,崇祯朝讨论户科给事中劝廉贪奏疏,裁撤驿站,追究会推国臣之事等,均择用时人的原话或形神兼备、声情并茂的对话,读来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梁启超说,只有材料而文字欠优的史著,只是粗糙的史学。如《重写晚明史》这样可以



樊树志



《重写晚明史》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2024年出版

与古人对话的史书,材料与文笔兼胜,是时下难得能够读到的精品。如《王朝的末路》篇描述:“次日,两袖清风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后面跟着一个仆人,肩扛着包袱,离京南下,景况着实有点凄凉落寞。”原文是“次日,刘公骑一驴,一仆负袱被,出顺城门。”又如引录李长祥《天问阁集》:“朱由检与阁臣蒋德璟及周延儒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恨其太使乖!’已经看透了周延儒,‘太使乖’三个字,把先前的‘还是他好’的赞誉,抵消了大半。蒋德璟把这句话透露给周延儒,周延儒道出了内心秘密:‘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然而‘太使乖’并非灵丹妙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样的叙述,把崇祯年间后50个大学士辅助皇帝多无好下场这一“伴君如伴虎”的典型刻画得极为传神,前后评语又入木三分。更有《王朝的末路》篇所附《读《梅村家藏稿》札记》,对传主吴伟业寄予了深切同情,写得回肠荡气,令人一唱三叹。

晚明文献浩如烟海,内容也相当芜杂,如何取舍颇见功力。《重写晚明史》着力征引当时人的记录和官方邸报等,对当事人的文集、日记等尤多发掘和利用,不少文献如顾鼎臣《顾文康公文集》、江东之《瑞阳文集》、钟羽正《崇雅堂集》、陈继儒《眉公见闻录》、张国维《抚吴疏草》、项鼎熊《呼村日记》、徐肇年《甲乙日记录》与《续丙记记录》、文震孟《文肃公日记》等,未见或少见前人引用,作者披沙拣金,皆从辛苦中得来,而且注释规范详细,了无时下通史类著作辗转抄袭讹讹选出的毛病。

《重写晚明史》也非常注意吸收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的国内外学者的看法,仅就日本学者而言,西岛定生、吉川幸次郎、山根幸夫、小野和子、森正夫、滨岛敦俊、川胜守、滨下武志、岩见宏、谷口规矩雄、岸本美绪、岩井茂树等,都是富有代表性的。作者站在学术前沿,及时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容纳海内外一流学者的学术新成就,因而毫无疑问,《重写晚明史》既是晚明研究的集成之作,也是明史国际学界的突出贡献之作。